

●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发展报告”课题组

向常规增长形态过渡中的上海经济

1992年上海经济的持续回升，和由此诱发的种种外在事实，引起社会各界对上海经济增长格局的不同判断，分歧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正常，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进入稳定增长阶段。我们认为，自1992年经济效益滑坡得到有效控制后，上海经济增长进入了由过去的非常规增长向新型的市场体制下的常规增长转变的过渡阶段。根据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传导周期，过渡阶段将持续大约三年，1992年是第一年，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年，无论是存量结构的恢复与调整，还是增量扩张，都会以很大的力度影响经济增长及其形态转变。所以，我们严格地将1992年视作这样的特定阶段，并由此出发，去理解其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良好转机和不稳定因素。已经出现的良好转机是新的常规经济形态得以生成的生长点，但在短期内不一定表现为增长指标的上升，甚至相反地表现为某些增长指标的下降，关键要看增长指标变动的趋势性特征；已经暴露出来的不稳定因素，有的将会随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过程的延续而逐步消失，有的则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变得更加突出，构成今后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强硬制约因素。

一、过渡中的不稳定

自去年一季开始，上海经济持续回升，工业生产的恢复性扩张和新投资项目激增，强化了社会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尤其是去年下半年部分经济增长指标趋于平稳，不少人据此判定上海经济已经走出超常规波动，进入稳定增长阶段。我们认为，上海目前经济增长格局的总体特征是恢复多于调整，增量变动快于存量变动，数量扩张快于效益增长，因而，还不能根据短期增长的良好势头判定上海经济增长已经步入稳定常态。

某一经济体系是否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其判断依据不在于短期增长水平，而在于经济增长类型和长期增长因素。据此，我们从市场经济的常规运行状态中选定以下四个判断依据：

1. 经济增长是数量扩张型还是效益型增长。某一经济体系只要未能从根本上走出数量扩张型循环，即使其短期增长水平较高，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瓶颈制约或通货膨胀，都不能认为是稳定增长。

2. 增量扩张与存量结构变动是否协调。增量扩张总会或多或少地引起存量结构变动，存量结构变动也依赖于增量扩张。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是增量扩张与存量结构变动的协调统一，否则，增量扩张速度越快，经济体系就越不稳定。

3.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我调适能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过速，甚至导致所谓“过热”局面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增长过程缺乏自我调适的内在机制，增长“过热”只能依赖于外部政策的收紧来降温。一个缺乏自我调适能力的经济体系必然循环于大起大落，而不可能

进入相对稳定的增长循环。

4.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对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反应弹性。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需求结构变动幅度和方向是产业、产品结构变动的参照系。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体系，其产业、产品结构对社会需求结构变动具有充分的反应弹性；一个缺乏弹性的经济体系，要么是压缩社会需求，服从“短边规则”，维持低水平均衡，要么在供求矛盾持续恶化的条件下高负荷运行，这两种情形都不可能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上海目前的经济增长格局并不充分具备稳定增长的条件。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上海产业部门物质消耗系数一直有增无减，而且社会总产值增幅愈大，物耗系数增幅也愈大，尤其是1986年以后。这种反映经济效益极度低下的现象目前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为突出，物耗系数从1986年的63.9%上升为1992年的71.5%，各部门物耗系数均已达到历史峰值，连过去物耗系数一般不超过20%的商业供销部门也已达36%以上。这起码表明上海经济增长仍属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持续时间越长，经济体系越不稳定。

第二，去年上半年的加速回升和下半年的平稳回升，主要导源于投资需求扩张，而投资需求扩张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是市场疲软时期累积起来的潜在投资需求充分释放的结果，产业体系的实际技术构成和结构水平并未随投资总量扩张而同步提高。同时，全民企业的基建投资重心虽明显地向第三次产业倾移，但实际经济增长率最高、增长速度最快的仍是第二产业。这两种情形无疑证明增量扩张与存量调整速度的不对称，而这正是我国过去一直未能克服的一大顽症。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致并颇具影响的推论：只要经济增长是由最终需求拉动的，就不会导致经济过热；上海经济增长过速是由最终需求扩张拉动的，所以不会出现80年代中后期的过热。我们认为这种推论似是而非。且不论目前的高速增长是否会导致过热（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一定表现为经济过热，两者的相关条件差异很大），仅就经济增长与最终需求扩张的关系而言，任何经济增长都是由最终需求扩张拉动的。问题在于：第一，最终需求扩张与中间产品供给能力是否协调；第二，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是指最终投资品需求，还是最终消费品需求。如果基础性中间产品供给条件严重不足，尤其是在价格正向调节不利于基础产业发展的非均衡增长格局中，最终投资品需求张力越大，市场供求矛盾便越突出。从上海物资供应条件和价格变动的结构性特征看，最终投资品需求扩张与中间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已经构成经济体系中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另外，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品需求扩张拉动的，则易于形成经济增长的正态循环，只要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由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一般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超常规波动。但上海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投资品需求扩张拉动的，因而不具备维持正态循环的条件。目前已经出现的结构性瓶颈制约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轻信最终需求扩张会无条件地拉动经济稳定增长的推断，将使我们的结构调整措施和政策选择失去主动性。

上海毕竟是综合发展实力雄厚、市场吞吐能量较大的地区，加上近几年市场化体制发育正常，经济体系的自我调适能力和产业、产品结构对社会需求变动的反应弹性已明显增强，不至于因短期内的数量扩张和局部的结构性冲突而出现大幅度的超常规波动。但也必须看到，只要上海经济不能真正从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中拔足，使存量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就不可能顺利地步入稳定增长阶段。目前的高速增长是存量结构调整的有利因素，上海必须积极地利用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加速存量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形态的转变。

二、怎样看上海199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统计资料显示，上海1992年主要经济增长指标比1991年上升幅度较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9%，其中第二、三次产业增幅较大，分别增长17.0%和11.0%；工业总产值增长21.0%；地方预算内全民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增长9.2%；亏损面缩小1.8%，亏损金额减少18.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4%，其中生产性投资增长33.0%，非生产性投资增长28%；外贸净出口换汇减少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8%，其中吃、穿类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分别达到19.0%和23.5%；银行贷款增加17.6%，其中流动资金贷款增加17.3%，固定资产增加18%，农业贷款增加31%。由于人们对80年代中后期的宏观失控仍心有余悸，担心目前的高速增长会引起新一轮所谓“过热”。我们认为，某种水平的经济增长率是否适当，并不简单地反映于增长率指标本身，还必须根据一定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增长的环比基数及其他相关因素去综合判断。

上海经济增长中包含着种种不稳定因素，这是事实，但不稳定的根源主要在于目前过渡时期经济增长与存量结构变动的不对称和投资扩张与经济效益的不对称，换言之，只要这两种对称关系同时存在，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合理的。所以，单纯从经济增长速度指标出发，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作为经济增长形态转换的过渡阶段，结构优化，进而保持经济增长的数量水平和结构水平相协调，对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格局更具有决定意义。但是，根据我国过去长期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实践，结构调整必须借助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当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的时候，结构变动也随之减缓，除非政府以强制性行政措施，调整存量结构，如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调整。“治理整顿”阶段的教训更能说明问题。中央本来寄希望于“治理整顿”为经济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优化产业分工结构和组织结构，强化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实际效果相反，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结构刚性愈加突出，直到去年的经济全面回升，结构才逐步“解冻”。按此逻辑，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形态转换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理当加速经济增长，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带动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维持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高位循环。至于两者是否协调，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制在多大程度上约束并调整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强化经济体系的自我纠偏、自我调适功能，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取向和贯彻力度。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体系的稳定程度对立起来，有悖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

另外，上海1992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1990—1991年的低速度为基数的，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从西方产业波动的常态特征看，经济衰退之后都会出现或长或短的投资扩张期，以带动经济恢复和存量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很快达到峰值，随后便稍有回落，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上海体制转轨速度较快，经济运行机制已接近于市场经济的常规运行机制，所以，在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出现投资扩张和相应的高速经济增长，实属正常，起码没有超出市场经济波动的常规机制。退一步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将上海本地区乃至全国的总需求带出低谷，形成需求拉动和需求约束相统一的经济增长格局。

前面已经指出，上海经济增长尚未能从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中拔足，而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的最突出特点之一是投资加速系数较大，即一定的收入水平必须以更大的投资水平来维持，边际投资收益低，只能从投资的加速扩张和经济加速增长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国民收入。只有最终走出数量扩张型循环，进入效益型经济增长循环，这种靠速度来维持国民收入水平

的情形才有可能自行消失。

上海的高速经济增长还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关。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H. Chenery）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上海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578元人民币，按可比价计算为1100美元左右，所以，在1992年出现高增长，符合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与经济增长率的常规关联程式。日本在1965年，香港和新加坡在1971年，台湾在1975年，南韩在197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都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在5—10年内翻了1.5—2.5番。这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借助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大约10年之内，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使第一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三次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比重迅速提高。这也符合“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水平变动的关联程式。由此，我们既可以认定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超出常规程式，也可以进一步推断上海经济增长正在向市场体制下的常规增长形态转变。作为紧缩造成的投资反弹，目前在回升阶段出现并保持较高的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正常的；作为经济增长型态转变中的过渡阶段，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使高速增长与存量结构调整协调一致，与经济起飞对产业结构水平的要求相对吻合，避免新的大规模的瓶颈制约和超常规波动。

三、虚增长因素消失后的超负荷运转

上海1992年经济增长格局虽出现明显的良性转机迹象，但自“六五”期间已经出现的地区经济超负荷运转的局面仍十分明显，其主要标志是地方财政负担与经济效益水平的不对称，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与资金供给条件不对称。理解这种不对称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上海过去长期维持经济低负荷运转的虚假条件。

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经济效益指标看，“七五”以来投入率渐增，产出率渐跌，劳动、资本和技术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分别是11%、64%和18%，而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只有0.33和0.17，属典型的以资本和劳动消耗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在“六五”以前，维持这种粗放型经济，上海的压力并不大，种种外在的虚增长条件可以减轻经济运转负荷。

第一，上海大部分国营企业的基础设施来自建国后的政府接管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明显低估资产原值；辅助性配套设施，如商店、宿舍、学校、医院等，不需要企业负担，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剪刀差和国家对上海原材料供应条件的保障等等，既大幅度减少了企业的不变成本和变动成本，又降低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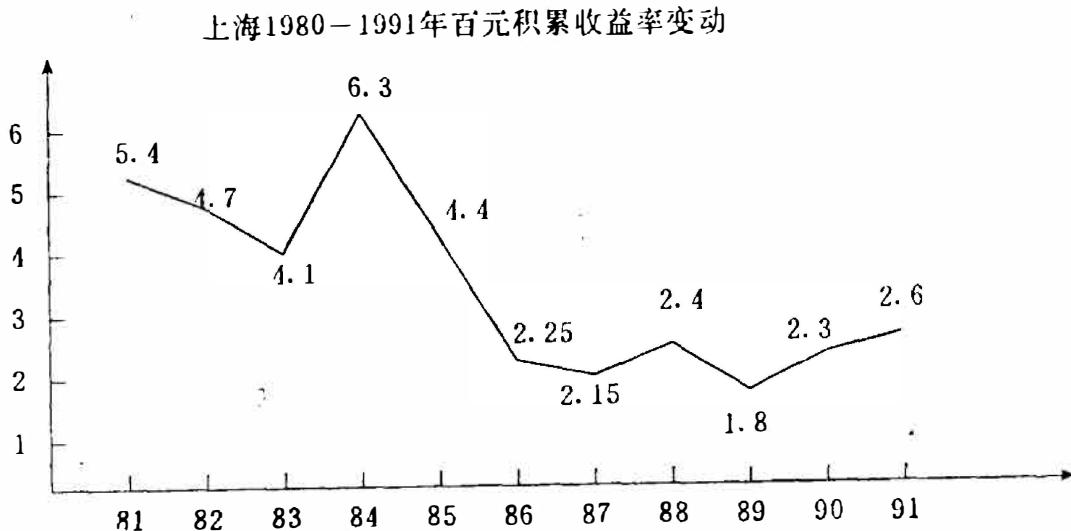
第二，上海工业发展起点高，建国前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全国任何其它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上海节省了大量的城市基建投资。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六五”前30年，上海基建投资仅占全国的3.6%。基于这一条件，既可完成占全国财政收入15%的财政上缴任务，又可将地方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维持国民经济的低负荷运转。

第三，依靠集中管理、统购统销的计划体制，上海几乎垄断了全国80%的需求市场，以产定销，加上由雄厚的资金条件所维系的生产规模优势，经济效益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些只有上海才具备的经济增长条件，既维持了长达30多年的低负荷运转，又构成上海经济体系中的潜在危机。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日益提高和区域经济关系在市场因素作用下的重新整合，加上原基础设施的自然磨损和技术磨损，上海的原始“老本”已消耗殆尽，工业发

展条件被降到与沿海地区相对等的水平。

原有的资源供给系统已经解体，由计划保证的低价原材料、能源已进入市场流通渠道，基础产品与加工产品的价格差所形成的非市场收益逐步流失，并迫使上海另起炉灶，发展自己的二次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培植基础产品的供给条件。产业体系和供给条件的如此变更，导致大量投资由原来的加工行业转入基础行业，扩大了基建规模，相应地延长了投资周期，其明显后果是百元积累收益率指标自1980年之后呈大幅度的趋势性下降或低水平徘徊（如下图）。



资料来源：据《上海经济统计年鉴1992》表1—1、51—20资料计算整理。

说明：“百元积累收益率”指下年国民收入与上年积累总额之比，这里分别按各年价格国上升指数对民收入作了滞后一年的价格折算。

上图反映的趋势特征表明，上海自“六五”开始，产业体系出现了外部环境日益开放与内部结构日益收敛的二重倾向，即外部资源供给条件日益市场化，环境优势日益分散，产业链条不得不更多地向基础产业延伸。

为培植基础产业供给条件，缓解外部环境变动给工业发展造成的瓶颈制约和市场压力，上海采取两项主要措施：一是在本市大上二次能源，原材料工业项目，走内向型道路；二是与内地联营，扩大基础产品生产基地，并保持上海产品在内地的市场份额。由于内向型发展与市场取向的冲突，二次能源，原材料工业投资成本太高，加上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在产权关系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上缴利税不变的非市场体制约束下缺乏应有的经营规范，上海的两项措施几乎全部落空，对内地的16亿元基础性投资，投入产出比仅为1：0.2左右，与内地联营的产品反而因质量不过关丧失了上海产品在内地市场的更大份额。

上海经济虚增长条件的丧失，无异于在上海经济机体上插入一把“双锋剑”——市场分配与计划供给条件转移，导致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以内向型发展措施补充基础产业的供给条件，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地方财政支出，同时，中央对上海的财政统收统支政策在“六五”时期恶化了上海的资金供给条件。由此，上海经济只能在高负荷下低效率运转。

可能正因为上海过去长期有“老本”可吃，国家和地方都忽视了老设备的更新和老城市的改造，以致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因素日益累积。进入“七五”时期，“老本”再也吃不下

去了，外部供给条件又在日益吃紧，上海背上了沉重的财政支出包袱：其一，发展出口型产业，支撑进口原材料和先进设备的用汇需求；为引进的工业项目提供配套资金。其二，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和市场化体制改革进程，迫使上海投资于机场扩建、新客站、水污染处理工程、道路改造、越江隧道维修改造、程控通讯网建设，等等。其三，国营企业高度密集，明亏和暗亏的约占一半，但几乎都面临设备更新、改造，产品换代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在私营、三资企业和沿海各地企业产品技术升级、成本降低、竞争优势日见明显的情况下，上海的国营企业如履薄冰，没有财政支持，连生存也难以维持。其四，市场结构变动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所必须具备的综合社会化功能，决定了上海产业优势的确立，已不在于继续扩大第二次产业的基数，而在于提高第二产业技术档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次产业，尤其是发展交通运输、金融和综合科技咨询服务，实现产业体系存量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但是，几十年累积起来的结构刚性，几十年形成的技术经济基础，决非一纸政令所能动摇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五，上海一部分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几乎无例外地是国家的利税大户，企业发展能力受到财政负担的严重约束，在沿海地区可以享受各种政策优惠的条件下，更加不堪重负，连本来市场份额较大的食品、饮料、化妆品、服装、鞋类等轻纺工业产品也纷纷丧失竞争优势，以致地方财源渠道愈加狭窄。

中央为了稳定上海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曾采取过几项大的“救火”措施，其中包括1987年底出台的上海上交105亿的财政包干方案，但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负担太重，再加上“治理整顿”期间经济全面衰退，中央的“救火”措施并未取得明显实效。

我们正是以虚增长条件丧失后的高负荷运转为背景去考察上海1992年经济增长总体格局的，从中，我们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虽尚未带动经济效益同步快速回升，但已经基本熬过了虚增长条件丧失后的阵痛期。相对于前十年的经济运转负荷，1992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展示了上海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第二，1992年的经济增长中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但虚增长条件毕竟已经不复存在，经济回升完全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中，依靠自我调整、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发展实现的。就此而言，低速度的效益回升，其效果也远远超出建国后三十年内低负荷运转条件下的高效益增长。

第三，在财政负荷与经济效益严重不对称情况下，大批基础性建设项目已经完成，产业存量结构已经随市场结构变动而相应地得到较大幅度的调整，尤其是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回升较快的条件下，以更快的速度超前发展，标志着几十年累积起来的结构刚性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已经减弱。以此为起点，只要更积极、自觉地保持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相互协调，上海经济将在“八五”期末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第四，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既需要充分的要素投入去发动，也需要合理的结构调整去利用。上海1992年继“七五”大型项目陆续投入使用后，又迈出了沉重而卓有成效的一步，虽然目前仍处在数量扩张快于结构变动、恢复多于调整的不稳定增长阶段，但毕竟是在向效益型稳定增长常态过渡。

本文是“发展报告”的一部分，由石磊执笔。